

西北地理和元史之研究

王重民 遗著

“西北地理”原来是指的十八世纪之间研究新疆地理的一个小小学派。随着社会政治的变化与国际关系的变化，研究的范围和对象，逐渐扩大到蒙古、青海和西藏的地理和历史，再后，还把西南的云南、贵州、四川包括在内。终至于从研究西北地理转到元史，而把元史作为这一研究的主流，最后成为研究中亚和东南亚的一个大潮流。

清封建政府征服了中国以后，从1690—1760年，一共十七年的时间，用极残酷的屠杀，征服了蒙古、新疆、青海和西藏等地方，称为“藩部”。从此以后，一方面用血腥统治，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，另一方面在史册上夸耀武功给汉族人民看，以期汉族人民消灭华夷中外的成见及其反抗外族统治的思想和运动。

新疆的准、回两部是抵抗他们的征服者最力的两个民族（准部在1757年被征服，回部在1760年。）大约在这两次战役的二十多年以后，清政府纂修了几次官书，都是着重在记载这些“武功”和新开辟的疆土。第一次是在十八世纪末年纂修清朝文献通考的《四裔考》，第二次是1801—1813年续修《大清会典》，第三次是1821—1842年续修《大清一统志》。在编纂这些官书的时候。参考了一些档案，培养了一些专家；而所培养的专家和当时当地的学者，其中有一些是被充军到新疆去的。（如1770—1771年纪昀充军到乌鲁木齐，1799—1800年洪亮吉充军伊犁，1805—1809祁韵士，1812—1820年徐松，都是充军到伊犁去的。）因此，更给予他们实地旅行和调查的机会，使他们的研究更深入。这时候，东南海上来了外国的侵略，具有先进思想的学者，便把研究西北地理和御侮图强的思想

结合起来。后来，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成，这些地区成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对象，派遣了大批的传教士和考古队，进行侦察间谍活动，这一研究又被帝国主义分子所利用，成为敌人向我进行侵略的工具之一。因此，阐述这一主题内的历史地理著作，必须和当时的社会政治，国际形势密切相结合。

祁韵士是研究西北地理较早的一人。他在1783—1790年间，借着在国史馆编纂《蒙古王公功绩表传》的机会，检查了大库所藏的红本，获得了一些从前官书所没有的资料。1805—1809年他被充军到伊犁，帮松筠编纂《西陲总统事略》，又接触了大批的地方材料。最后，在这些资料和亲自考察的基础上，编成《皇朝藩部要略》十八卷、《表》四卷。包括《内蒙古要略》二卷、《外蒙古喀尔喀部要略》六卷、《厄鲁特要略》六卷、《回部要略》二卷、《西藏部要略》二卷、和《内蒙古、外喀尔喀、西套以西各部、不列外藩各部表》各一卷。从此，为西北地理和历史的研究，奠定了基础。

1812—1813年，龚自珍还在青年的时候，担任过校印《大清会典》“理藩院一门及青海、西藏各图”的工作，这是他从事“天地东西南北之学”的开始，从此，他把西北之学和东南之学联系起来，而全面的注视着社会政治的变化。1820年，他写了两篇重要论文——《西域置行省议》和《东南罢番舶议》，他提出怎样把西北广大地区，化无用为有用，以应付从东南来的外国侵略。他主张移内地人民到新疆去开垦，就可以把“内地无产之民”化为“西北有产之民”，这对全国的益处是“人则损中益西，财则损

西益中。”可是从东南海上外国输入的呢、羽毛、钟表、玻璃和燕窝等商品，都不过是“上都少年”的“不急之物”，而效果是：一则流出了大量现银，二则防碍了本国蚕桑、木棉的发展，所以应该杜绝（《东南罢藩舶议》已失传，他的主张，一部分见于《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》一文中）。所以龚自珍的东西南北之学，一开始就是站在爱祖国的立场上，而是以图谋祖国的富强为研究目标的。

龚自珍在1820年以后，在国史馆参加《大清一统志》的纂修工作，在搜辑资料方面，和祁韵士一样，参考了政府的许多档册，把“西北两塞外部落世系风俗、形势、源流”，都就自己的心得，编入《一统志》内。还着手编写了《蒙古图志》，但未成书。

龚自珍的贡献，主要在他的研究方法、目的和思想，经过他的朋友魏源的继续发挥，获得了更多的成就，对当时的社会政治起了很大的进步作用。其余的学者，只是在客观的考据方法下面进行工作。

魏源在1829—1830年间，正是壮年的时候，在“掌故渊海”的北京，走着和龚自珍相同的道路，“借观史馆秘阁官书，及士大夫私家著述”，在一八四二年“海夷就款江宁之月”，也就是第一次不平等条约订立的时候，撰成《圣武记》十四卷，盛陈清初征服“西北”的武功，因此，曾经被认为是一部“媚虏”的历史著作。可是魏源自述他著书的原因，是在“海警颺忽、军问沓至，慨然触其中之所积，所以陈述过去的“柄强桢富”，正是要反映当时的柄不强、桢不富，想显示出社会政治的变革就要到来，从而提出御侮图强的思想要求。（侯外庐的《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》六三六页，《圣武记》“可以当作近代第一次的议时政的万言书去看待，实不能以‘媚虏’二字概括了的。”我非常同意。）紧接着又完成了他的《海国图志》。若把《圣武记》和《海国图志》联系起来看，正是西北之学与东南之学的对立的

统一，进一步显示出龚自珍的东西南北之学的政治意义。

徐松、张穆和何秋涛继承着祁韵士客观的考据而又把西北地理推进了一步。

徐松1812年充军到伊犁以后，受松筠的委托，继续《西陲总统事略》的编纂工作，经过了广泛的实地调查和访问，编成《新疆识略》十二卷。徐松作实地调查的时候，特别注意新疆的河流，撰成《西域水道记》五卷，当他撰《识略》和《水道记》的时候，为了叙述历史源流，又参考了大量的史书，就其心得，又撰成《汉书西域传补注》二卷。

张穆是徐松的朋友，又担任过《藩部要略》的校印工作，由于受了祁韵士和徐松的启发，撰《蒙古游牧记》十六卷，但没有完成，由何秋涛补成之。何秋涛又撰《朔方备乘》八十一卷。张穆、何秋涛的著作，都是以蒙古的历史地理为中心，《朔方备乘》更扩大到中国北边西边与俄罗斯帝国的关系方面。中国和俄国都是在第十三、四世纪曾经被蒙古征服和统治的国家，对于蒙古史的研究，都有过很多的成就，所以研究西北地理的重心，不久又转到元史上面去。

我国学者研究元史，最初是由于1370年修成的《元史》极其草率，到了十八、九世纪中间，以著名的史学家钱大昕为首，发见了《元史》的许多缺点，发掘出了有关《元史》的如《元朝秘史》、《圣武亲征录》等极重要的原始资料，因而提出了改造元史的倡议。这是研究元史的第一时期。由于时间和环境的限制，第一时期只能作旧有资料的整理。到了第二时期，方能把研究的范围和年代扩大，而利用了外国所保存的新资料。

魏源的年代介在研究元史的这两个时期中间，他的《元史新编》在研究元史的过程中，也的确起了中间作用。但还应该注意的就是今文学家的著作，总是反映着他们政治思想上的进步作用。

魏源的《元史新编》是承接着他的《圣武记》、《海国图志》而作的。欧洲的俄、德、法、奥等国家是十三、四世纪曾经受过蒙古侵略的国家,而那时候他们正在向东方(主要是中国)发动侵略,这当然是他们又重新研究蒙古史的动机。在魏源方面,那时候的中国正是被另一个外族统治着,而又是正在显示着另一个变革时期,但由于他的思想和时代的局限性,他还把希望寄托在外族统治者身上,希望它能够图强,抵制西方国家的侵略。他在《拟进呈〈元史新编〉序》内指出:元代对待中国人民的不平等和压迫,“内北国而疏中国,内北人而外汉人”,造成“贫极江南,富归塞北”的情况,清政府正是走着这样的道路,可是“天道循环,物极必反”,应该看清楚的是,元代把中国造成一个“外强中乾”的人,韩山童率领农民起义军一呼,“向之畸重于北者终复尽归于南。”这就给清政府提出了严重的警告。他又指出:元史的“荒陋疏舛”,也是由于元人把一些本来可以公开的史籍,如《元朝秘史》、《圣武亲征录》等,对汉人“深闭固拒”所致。他在“修《海国图志》之余,得英夷所述五印度、俄罗斯元裔之始末,牴牾旧史”,才展开了对于元史的新研究。魏源所得到的外国资料虽说极其贫乏,可是在研究元史的新方向上,已经放出了新的曙光。

在魏源同时或稍后,仍然局限在整理中国旧有的元史资料,其间的重要著作是何秋涛的《圣武亲征录校正》和李文田的《元朝秘史注》等。到了洋务运动时期,我国开始派人去西方国家,才充分利用了外国的新资料,把元史研究,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。(即进入第二时期)。

1370年编成的《元史》仅包括蒙古统治中国时期的历史(1270—1368年),(蒙古没有入中国以前的历史1206—1279年)和西方三汗国的历史,都不包括在内,这对蒙古那

一时期的整个历史来说,是极不完全的。可是在十三、四世纪蒙古统治中国的同时,波斯、叙利亚、阿美尼亚等地方历史学家,对于蒙古初期和西方三汗国的历史,留下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著作,如拉施特的《蒙古史》志费尼的《世界征服者史》都是极有名的。但由于绝大多数是用波斯文、阿拉伯文写的,在西方国家流传有困难。因此,西方国家在十九世纪初年对中国展开侵略以后,便兴起了翻译或编译波斯文蒙古史的风气。如俄国的贝勒津,法国的嘉特梅耳、伯劳舍把拉施特的《蒙古史》译成俄文和法文,法国多桑的《蒙史史》(1852年),德籍上耳人哈木耳的《金帐汗国史》(1840年出版,应俄国皇家学院的徵求而作),俄国哀忒蛮的《帖木真传》(1862年)以及英国特儿渥特的《蒙古全史》都是研究了许多种波斯文旧著而后编译成书的。这些翻译和编译工作,在洋务运动时期没有派出使节以前,大致都已出版了。

在我国学者检查研究我国的元史史料;欧洲人翻译波斯、阿拉伯等文的元史史料以后,双方面的研究工作获得了联系和相互补充,第一次开辟这一工作的是洪钧。

1887年,洪钧作了“出使俄、德、奥和四国大臣”,他的使节几度经过巴黎、又曾经长期驻在俄国和德国,因得搜访并翻译了拉施特等蒙古史著作,也参考使用了多桑等所编译的新的元史著作,撰成《元史译文证补》三十卷。”“证者”,校正中国旧有元史资料中不正确的地方;“补者”,补充中国旧有元史资料中所没有的新资料,从此使中国对于元史的研究,冲破了旧的范围,开辟了新的时代。

洪钧以后,屠寄、柯劭忞和其他史学者,继续综合利用中国和外国资料,使元史学的研究,获得了更高的成就。屠寄撰《蒙兀儿史记》标识着著书的范围,已经不是《元史》而是《蒙古史》了。柯劭忞撰《新元

史》，标识着在这一时期内，初步完成了从钱大昕以来对于元史的改造计划。

1862年洋务运动开始的同时，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国家（稍后，日本也来侵略，所以也应把日本包括在内。）为了侵占中国土地作准备，不断派来大批的探险队、考古队，在我国西北和东南的边疆上进行侦察。1874——1900年中间，经过两次割地狂潮，接着又提出了瓜分之说，军事侵略加紧，间谍侦察便更活跃，而所使用的方法也就更隐蔽，所以到后来他们多用考古队的名义作掩护，除了进行有利于军事侦察以外，还劫掠了大批文物。

当我们的元史研究和西方资料接触以后，我们对于西北地理的研究，转向到各正史内四夷传、外国传的地理考证，这一工作由丁谦集了大成。他的著作都刻入《浙江图书馆丛书》里面，凡两集，第一集包括从《汉书》到《明史》的《四夷传》、《外国传》

的地理考证三十六种，第二集包括法显《佛国记》、杜环《经行记》等有关西北和外国的地理书籍十四种，所考证的这些地方都是已被或者正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侵略。而西方国家在翻译和编译蒙古史的高潮以后，随着探险队、考古队的侵略工作，又掀起了翻译有关我国边陲地区和东南亚各国历史地理书籍的高潮。

中亚和东南亚的古代历史地理，由于他们本国缺少记载，而在中国史籍内，则保存了极丰富的资料或专著。这些资料和专著在这一时期内多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翻译出版，他们一则可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，二则可以向已侵占的东南亚国家的人民作夸耀。

翻译成为西方语文的重要著作，有《文献通考》里面的《四裔考》、有法显的《佛国记》、宋云的《行纪》、玄奘的《大唐西域记》、有赵汝适的《诸蕃志》、周去非的《岭外代答》、周达观的《真腊风土记》等。

《〈毋忘台湾〉序》将收入郭沫若全集

《〈毋忘台湾〉序》是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同志一九二六年六月写的，收作《毋忘台湾》一书序文。一九五五年中山大学谭彼岸先生在图书馆查阅资料时，发现这是一篇郭沫若同志所未收集的佚文。一九五七年《毋忘台湾》一书的编者、中央民族学院杨成志教授来到广州，在我校图书馆见到此序文，欣喜异常，证实确系郭老佚作，当即把它拍照带回北京。之后，冯乃超同志又嘱图书馆人员将序文复制，送往北京有关部门。现在这篇序文准备收入郭沫若全集。

从《毋忘台湾》一书可以看出，这篇序原是为《一个台湾人告诉中国同胞书》一文而作，后来“告同胞书”和杨成志先生的《看了〈一个台湾人告诉中国同胞书〉以后》合编成一本小册子，定名为《毋忘台湾》，于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由广州丁卜图书馆出版，这篇序也就成了这本小册子的序文了。

节自林飞鸾：读郭沫若同志《〈毋忘台湾〉序》，载《中山大学学报》1979年第3期。